

乾隆皇帝對古側理紙的賞鑑 與再造

何炎泉

在文化上頗多建設的乾隆皇帝（一七三五～一七九五在位），對於古代紙張特別有研究，仿製出許多書法史上的名紙。尤其是東晉側理紙，這個只出現在書上的東晉名紙，本身就是一個傳說，在追索側理紙的過程中，還涉及到對於這種紙的種種的現代認知與古代知識。乾隆皇帝除了展現本身的興趣與獨到的眼光外，更運用其龐大的各種資源，最後成功地仿製出側理紙。透過這古代側理紙的個案研究，不僅有助於瞭解乾隆皇帝對於紙張的鑑賞品味，還能認識他在重建古代造紙工藝的努力與巧思。（註一）



一、古側理紙

乾隆皇帝於丁丑（一七五七）春南巡時，傳說中以海苔所製的東晉側理紙無意間闖進了他的生命中。（註二）趙昱（一六八九～一七四七）以其小山堂舊藏兩

張側理紙進獻（註三），因獲賜官錦，同郡人沈廷芳（一七〇二～一七七二）以「賜錦堂」稱其小山堂，並由梁國治（一七二三～一七八六）書寫新堂名，傳為浙江一時佳話，事載於沈德潛《趙徵君賜錦堂記》（《清

朝野史大觀》卷九）中。獲得這兩張側理紙後，乾隆皇帝才開始認真看待這個歷史悠久的東晉名紙。隔年（一七五八），乾隆賦《詠側理紙》（戊寅正月）詩：
海苔為紙傳拾遺，徒聞厥名未見之。何



圖2 時代不詳 古側理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寫，《石渠寶笈續編》著錄中提到〈詠側理紙〉（縱九寸七分，橫二尺七寸五分）書於「側理紙」上，顯然就是使用此紙。不過，著錄上可以發現乾隆皇帝早在一七五七年的冬天就使用過新收藏的側理紙來書寫，一件是〈御筆大寶箴〉（縱九寸七分，橫五尺五寸三分）卷，自題：「頃得古側理紙，復書此卷藏之。丁丑（一七五七）仲冬月。」另一件為〈御臨米芾雜帖〉（縱八寸三分，橫五尺五寸）卷，題曰：「側理紙以海苔為之，見王嘉《拾遺記》。今

春南巡有持獻者，古色盎然，非近世楮工所能製，臨此試之。時丁丑（一七五七）長至日前一日也。」若按照書寫年代與紙張尺寸看來，這三張作品很可能就是從一張大的側理紙上裁下。關於側理紙的尺寸，清金壇（一六六三～一七四〇）〈雜綴兼詩話〉回憶：

己亥（一七一九）秋，闕里孔東塘（尚任）塲載餘，予重平過其居，索觀其家藏唐硬黃、宋海苔側理二紙，與嗣君榆擊、衍志坐黃玉齋，摩挲竟日，洵法物也。顧失記其紙質輕重長闊之數。後覽孔翰博宏與毓埏所著《拾粹餘聞》，載列甚晰，云：「硬黃紙，長二尺一寸七分，闊七寸六分，重六錢五分，紙中之最重者。海苔側理紙，長七尺六寸，闊四尺四寸五分，紋極粗疏，猶微含青色」云云。因憶予家所藏澄心堂白麻，寶之四世，歸於香泉，幸貢入大內。而予為後嗣者，竟不得一親先世之物。觀榆擊所守，益增愧悵耳。（《不下帶編》卷三）說他自己已經到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家中觀賞其舊藏的側理紙，尺寸為長七尺六寸，闊四尺四寸五分，確實是相當大的紙張，所以可以裁成不同尺寸。不過，據孔尚任《享金並簿》所提：「側理紙，

方廣丈餘，紋如磨齒，一友人贈予者。」卻是長寬都超過一丈（十尺）的巨幅紙張，兩者之間尺寸相差頗多。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石渠隨筆》中也介紹過清內府所仿製的側理紙：「乾隆年間又仿製圓筒側理紙，色如苦米，摩之留手，幅長有至丈餘者。」可知側理紙的最大尺寸可以達到丈餘。金壇文字中還有一處要注意，就是側理紙在這些文人眼中是被視為宋箋，這個意見後來也曾被乾隆皇帝所接受。

乾隆皇帝還有一些使用側理紙書寫的例子，如《石渠寶笈續編》中〈御書洪範皇極〉（四尺五寸三分×二尺六寸二分，一七五八孟冬）軸、〈御書復卦〉（三尺五寸五分×一尺九寸六分，一七六二長至日）軸、〈御臨米芾元日帖〉（三尺五寸六分×二尺）軸、〈御書復卦〉（三尺九寸五分×二尺二寸五分）軸、〈御臨米芾草書帖〉（三尺二寸×二尺）軸等。這些作品形式都是比較大型的軸子，說明了乾隆皇帝所收到的側理紙確實在尺寸上比傳統書畫用紙大許多。（註六）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藏有一張清宮舊藏的空白側理紙（圖二），色灰白泛黃，有些斑漬與蟲蛀，紋路縱橫斜側，表面相當粗糙，並未經過加工處理，隨處可見稀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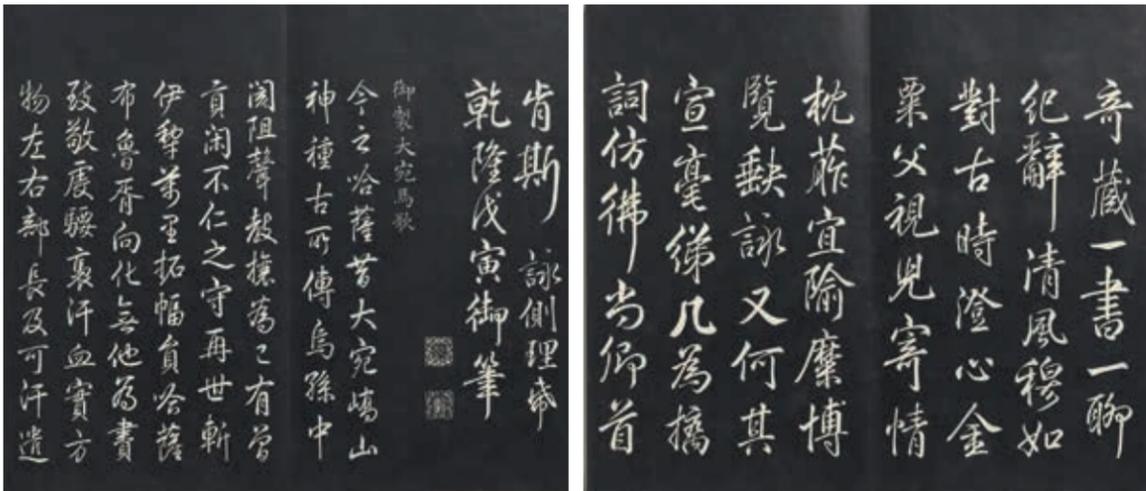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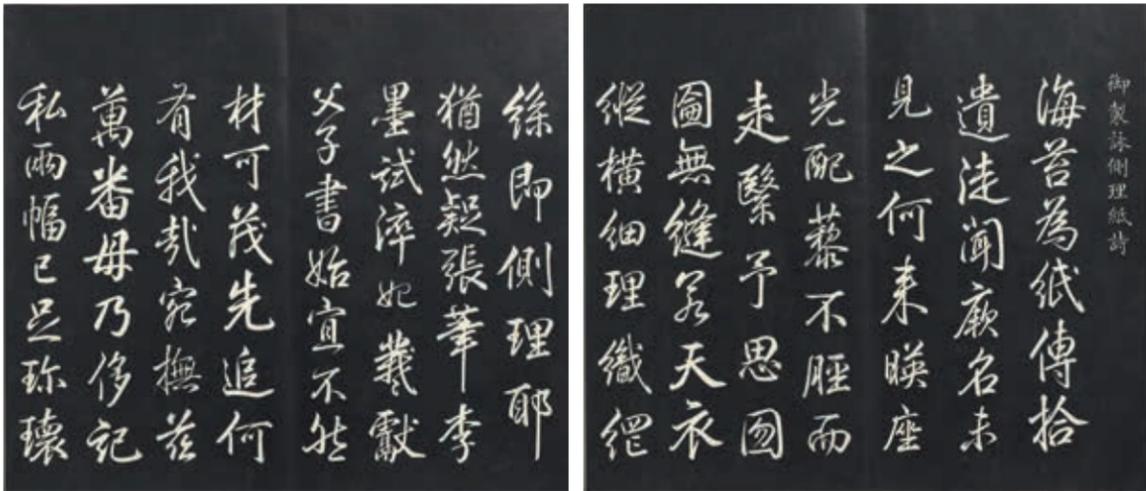


圖1 清 敬勝齋法帖（十二）拓本 冊（經摺裝）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來暎座光配藜，不脛而走翳予思。圓圖無縫若天衣，縱橫細緯織網絲。即側理耶猶然疑，張筆李墨試泮妃。義獻父子書始宜，不然材可茂先追。何有我哉宛撫茲，萬番毋乃侈記私。兩幅已足珍瓏奇，藏一書一聊紀辭。清風穆如對古時，澄心金粟父視兒。寄情枕藉宜隴廩，博覽缺詠又何其。宣毫緋几為摘詞，彷彿尚卿首肯斯。（《御製詩二集》卷七五）

此書蹟收入〈敬勝齋法帖〉（圖一），也是紀年於戊寅（一七五八），墨蹟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根據清人對於側理紙的相關文字記載，配合乾隆皇帝詩句「圓圖無縫若天衣，縱橫細緯織網絲」，可推知這種側理紙呈現圓筒狀，中間並無接縫處，紙質粗厚，紋理斜向縱橫。學者推測這種紙張所使用的抄紙器為圓筒狀，而且使用粗銅絲編成具有斜側紋之抄紙簾，並以極細銅絲來穿聯，大約出現於康熙年間，所以側理紙的生產應當不早於此時。（註四）此種裝置類似十九世紀初在英國所發明的單筒造紙機器，是以旋轉機械來抄紙。（註五）

乾隆皇帝詩中指出這種相傳為海苔所製紙早已失傳多年，他將其中一張拿來書



圖3 時代不詳 古側理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孔洞，全紙的厚薄極不平均，與尋常書寫用紙的品質差距甚遠。紙張紋理與乾隆皇帝所用側理紙相同，盒中附一小籤：「側理紙一張，係前代仿製。其色澤甚舊，性質性略絕粗鬆，不及內庫所藏。」（圖三）此籤雖未具名，然從書風上判斷可能出自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之手，直接指出此紙為前代所仿製，但是跟內庫所藏側理紙相較，則質地略為粗鬆，可見乾隆皇帝後來從內庫翻找出的五張側理紙品質較佳，而此紙應為南巡所獲之一。

全紙摺疊成長方形收於「古側理紙」（螺鈿）黑漆匣中，盒蓋及底皆有錦墊，攤開後尺寸約為一百三十四公分長，七十四公分寬（筒狀開口處）。紙張表面佈滿斜橫交錯的紋理，呈現菱形格狀，除了許多摺痕外，尚有一道疑似接縫的痕跡，細看後推測應該是圓筒抄紙簾之接縫，與乾隆皇帝詩句「圓圖無縫若天衣，縱橫細緯織網絲」所載相符。折疊收藏的方式也符合文字記載，徐珂（一八六九～一九二八）〈江玉屏見側理紙〉：「江玉屏，博物君子也！嘗適市，見有紙厚半寸許，連疊。揭之成毯，旁無端縫。人皆不能識，玉屏以為古側理紙也！或謂其得之於鮑濂飲家。」

玉屏，名立，乾隆時人。」（《清稗類鈔》鑒賞類）〈詠側理紙〉詩中最重要的無非就是「澄心金粟父視兒」這一句，完全點出乾隆皇帝對於這三種古代名紙的看法。由於他認為側理紙生產於東晉，自然被視為澄心堂紙與金粟山藏經紙的源頭，而澄心堂紙與金粟山藏經紙就成為兄弟的關係。澄心與金粟系出同門的看法顯得意義非凡，如此便可以解釋為何乾隆皇帝所仿造出的澄心堂紙會如此接近藏經紙，這對於澄心堂紙過去的種種傳說可說是前所未有的發明。（註七）

二、尋側理紙

〈詠側理紙〉詩中尚未提到在內府舊藏中發現的五張側理紙，所以詩成之時應該還沒找到，隔幾日後的〈再詠側理紙〉（戊寅正月）詩中才出現這五張紙：

南巡獲陟陟，兩幅珍瓊玖。錦囊藏其一，說項和吾口。西清有典司，檢點所奔守。五番哀時對，謂是束置久。誰知為海苔，徒觀麤且厚。恐不宜墨卿，未敢供几右。新獲與茲同，呈覽聽去取。撫掌輟然笑，天府何不有。或又當面失，奚藉不脛走。

紙堅過之，銅久較誠非三代范銅頗多，如側理不多見也。

浮碧虛稱錦，流黃謾說機。有名惟魚網，無縫乃天衣。

子邑堪方妙，右軍始稱去聲揮。

臨池亦偷暇，敢誤初時幾。（《御製詩四集》）充分顯露出對此紙的寶愛程度，並提出評價與看法。首先強調雖然晉武帝（二六五～二九〇在位）曾賜張華（二三二～三〇〇）側理紙萬番（註八），事隔千年後連一張都很難找到，因此他手中珍藏的七張側理紙絕對比晉代陶瓷或是二代銅器都還要珍貴。這裡又再次提到王羲之，用了王羲之贈予桓溫五十萬張側理紙的典故（註九），直接將他所珍藏的紙與書聖關聯起來。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傳說故事襯托下，乾隆皇帝試圖讓自己手中的七張側理紙更具有正統性與典範性。

三、仿側理紙

經過了二十多年，浙江杭州織造最晚在一七八一年已經仿製成功，乾隆皇帝於側理紙上寫下〈浙省新製側理紙成試書因得句〉（壬寅正月）：

丁丑初獲側理紙，訝為創見祇兩幅見舊詠

抑且瞿然懼，將毋人似否。（《御製詩四集》卷七五）

吾曾惜闕詠，誰識有河東薛道衡有〈詠昔紙詩〉，近題側理紙，有「博覽闕詠又何其」之句，始悟向乃未曾細考也。

典守百年出，滑堅五部同。

藏書皆得亞向獲僅兩番，故書一而藏一。今得五幅，或書或藏，皆有其副矣，金玉慢稱工。腕力惟慚劣，苔牋固不窮。（《御製詩四集》卷七五〈書側理紙得句〉）

乾隆皇帝之所以提到「始悟向乃未曾細考也」，主要是承認自己過去對於側理紙的錯誤認知。因為早在一七五七年獲得進呈的兩張側理紙之前，他在丙寅（一七四六）就已經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與王珣〈三四人四〇〇〉〈伯遠帖〉使用過「側理紙」來作畫。他在〈快雪時晴帖〉說「愛此側理」，〈伯遠帖〉則是提到這種紙「光潤堪愛」，表明自己非常喜愛這種紙，不過「光潤」的特性當然和他後來見到的粗厚斜紋側理紙完全不同。梁詩正、汪由敦（一六九二～一七五八）、勵宗萬（一七〇五～一七五九）、張若靄（一七一三～一七四六）、裘日修（一七一二～一七七三）、董邦達（一六九九～一七六九）等人在〈快雪時晴帖〉的共同

跋道：「因副頁宋牋古潤可愛，更濡筆作雲林小景。」直接指出乾隆所使用的側理紙為宋代牋紙，絲毫沒有意識或是考慮到側理紙與東晉或王羲之的關係。此外，乾隆皇帝在〈御臨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并圖〉冊中自題：「乾隆己巳（一七四九）冬至月，獲此宋箋，愛其側理如玉，與筆墨相發。」（《石渠寶笈續編》）可知他在那段時間確實是將東晉側理紙與宋箋混為一談，而且在質地上也完全搞混。不過，隨著兩張側理紙新藏品的入手，他展開一連串的研究與探索，也發現內府找到的五張與進呈的兩張為同樣類型的紙。最後，乾隆皇帝勇於拋棄過去對於側理紙的錯誤認知，重新擁抱新入藏的側理紙。第一首詩中提到這種紙「徒觀麤且厚」，外觀上看起來不僅粗而且厚，顯然不太適合寫字。不過，粗且厚的外觀正與南宋趙希鵠〈古翰墨真蹟辨〉中關於側理紙的記載相吻合：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洞天清錄》）

到了二七二二年，乾隆再作〈詠側理紙〉（壬辰）：

萬幅昔何夥，一番今已稀。

瓷堅知略勝側理紙出晉時，今無晉時陶器，知

側理紙詩。

既而懇勤檢庫物，五番原以弃之夙。

一再吟詠試墨卿，兼喻鑒人失清目丁丑南
巡得側理紙兩番。迴蹕檢查內庫，復得五番。曾
一再題詠，有「或且當面失，奚藉不脛走。抑又
瞿然懼，將毋人似否」之句。

通年做為命浙匠，始猶難之近則熟。

海苔漁網弗讓古，用實不竭勝越竹。

鏡牋滑潤玉版脆，此獨精堅更淳樸。

譬之漢庭固多材，相如輩夥沒黯獨。

既思何求而弗獲，於人艱哉益增惡。（《御
製詩四集》卷八五）

製詩四集》卷八五）

詩中指出自己過去曾經命浙江紙匠仿製，
但是並不成功，一直到最近技術才成熟。

有了側理紙的成功複製經驗後，乾隆皇帝
對於長期以來的疑惑作了一番總結，寫下

〈浙江製側理紙成，用壬辰詠古側理紙韻
題句，並仍以整紙書之〉（戊申五月）：

何以乘餘暇，喜書猶古稀。

做成古杭是，炫賈海苔非內府所藏側理紙僅
有數番，近浙省做製亦復相似。可知世固有能造

者，不必《拾遺記》所云：海苔為之也！或炫稱

晉時苔箋，皆賈人近利居奇之辭耳。

仍就囫圇體，隨其宛轉機。

短長不裁幅，蘿薛勝為衣。

斐几平陳待，綵毫疊韻揮。

上，內府收藏中不乏乾隆皇帝認可的東晉
名蹟，就以他摯愛的三希帖（王羲之〈快
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
遠帖〉）用紙標準來看，側理紙不僅在品
質上和這幾三張書法用紙無法比擬，彼此
間更是毫無一點關係，三希所使用紙張都
是屬於表面比較光滑的加工紙。也就是，
無論側理紙帶著多麼顯赫的光環，只要與
歷代法書名蹟用紙稍微相比，很輕易就會
讓此紙現出原形，一切的神話都會顯得格
格不入，這樣的比較肯定對收藏經驗豐富
的乾隆皇帝而言並不困難，加上他又親自
寫了不少側理紙，所以不可能完全沒有感
受到其中的差異。

前後歷時二十多年所仿製出的側理紙，
中間的停頓或許已稍稍反映出乾隆皇帝的
熱情不再，期間大概自己也有所發現與反
省，然而杭州織造卻是一直謹記在心，持
續研發。當乾隆四十幾年側理紙仿造成功
之時，他完全不考慮像仿其他古箋紙一樣
在紙上大張旗鼓地蓋上仿製印記，還大方
地將仿製的功勞推給地方，顯然已經有所
顧慮，僅僅將之視為晉紙傳說來吟詠對待，
重心反而在提醒自己要更加謹言慎行。

恍然有所慮，所好去聲慎茲幾。

昨既書壬辰（一七七二）詠古側理紙詩

於古紙，不割裂其原體。茲用前韻題浙

江做製之紙，仍以整紙書之。夫側理自

晉迄今千數百年，而茲所製竟能彷彿，

不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予因思之。偶詠

側理紙，而浙江即有做為之者。絮矩人

君所好，不可不慎也。（《御製詩五集》卷

四〇）

一七八八年五月，他先將一七七二年所作

〈詠側理紙〉書寫於珍藏的整幅古紙上（註

十），後來又用浙江所造側理紙書寫同韻詩

於整紙上。經過實際書寫的比較，他覺得

浙江所仿製的紙相當成功，完全接近內府

所珍藏的古側理紙。對於東晉王嘉（？）

約三九〇）《拾遺記》卷九所謂：「側理

紙，後人謂之陟釐。南人以海苔為紙，其

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提出反駁，認

為海苔製紙完全是商人基於炫奇獲利所想

出的神話，大可不必拘泥於古書上的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皇帝認為側理紙的仿

製成功乃出於「絮矩人君所好」，因為自

己「偶詠側理紙」所致，與其他特意仿製

的古代箋紙不同，因此誠自己將來言行必

須更加謹慎小心。

事實上，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

小結

面對歷史上的東晉側理紙傳說，乾隆
皇帝抽絲剝繭地從歷史文獻與內府收藏中
找尋蛛絲馬跡，隨著認知的增加也不斷地
修正自己對於這種紙張的看法，過程中不
僅展現出旺盛的求知慾，更顯露其在書法
文化上的涵養。就這樣，憑藉他對古代箋

檔案也記載：

（十一月）初十日，員外郎四德、五德、

催長大達色來說，太監鄂魯裏交圓筒側

理紙一張、單片側理紙一張。傳旨著交

杭州織造徵瑞照樣各成做十張，如用高

麗紙之處，聲明前來請領。欽此。

於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六月初八日據

杭州織造四德來文，內稱于三月初七日

將仿辦得樣紙二張在西湖行宮呈覽，奉

旨：筒子側理紙做的好，照此樣做一百

張，單片側理紙比原樣做的白了，仿原

樣顏色做一百張，得時陸續送京。欽此。

當今先辦得筒子側理紙三張，已于上年

八月在熱河呈進在案，今又辦得筒子側

理紙五張、單片側理紙五張，理合呈繳

前來等因記此。（註十一）

考慮先前的詩中也提到過剛開始仿製失敗

的狀況，所以最初的側理紙仿製顯然還是

乾隆皇帝的意思，不知為何他最終將此功

勞歸於杭州織造，其中原委頗值得玩味。

側理紙的表面粗鬆且紋理縱橫的特性，

若非種種傳說及與王羲之的關係，很難想

像這種紙能夠獲得乾隆皇帝的青睞，畢竟

在質地上完全與他喜歡的緊結光滑背道而

馳。從乾隆皇帝留下書法作品中，可以發

現他喜歡寫在光滑不吸墨的紙張上。事實

紙的深入研究與文化產業的高度興趣，加
上當時製紙工藝上的技術與豐富的古紙仿
製經驗，才能成功地仿造出消逝千年的古
代書寫用紙——側理紙，重新賦予新的生命
與意義。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 此文摘錄自拙著《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
代箋紙的賞鑑觀》，刊登於《故宮學術季刊》第三
卷第一期，二〇一五，頁三一五—三三六。
- 現代人研究參考劉仁慶，〈論側理紙——古紙研究之
二〉，《紙和造紙》，第二九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
年十一月，頁七〇—七二；張飛鸞，〈髮箋考辨〉，
《合肥教育學院學報》，二〇〇二年第三期，頁
六一—六三。
- 「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
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南巡駐劄時獻之，蒙綺錦之
賜。標在粵東曾見之，環連如大蒲，無首尾，紙上細
草萊，聯綿重疊，上有御賜印記。」（清）徐康，《前
塵夢影錄》，上卷，頁十一；也有認為是揚州鹽商江
春（一七二二—一七八九）得此珍貴側理紙二張以進
呈，據說此紙「棉厚數層，連疊揭之成球，旁無端
縫。」見張冰、趙佳平，〈造古紙秘技〉，《民間失
傳絕技：民間秘術大全》，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一九九三，頁六。
- 亦有認為明晚期至康熙末年，見郝炎峰，〈試論故
宮博物院藏側理紙的年代〉，《文藝生活（藝術中
國）》，二〇一四年第八期，頁一一五。
- 潘吉星，〈從圓筒側理紙的製造成到圓筒造紙機的發
明〉，《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七期，頁九一—

九三。

- 尺寸如此巨大的側理紙，加上圓筒無接縫的特徵，都
顯示這不可能出自東晉所製造，當時並無這種抄紙的
技術，所以還是以清代仿製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進
獻的兩張與內府發現的五張都應該是清代的製品。
- 何炎泉，〈尺牘（澄心堂帖）〉，《大觀——北宋書
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頁
四二九—四三三。
- 「《拾遺記》曰：張華獻《博物志》，賜側理紙萬番。
南越所獻也！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
為誌，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宋）李昉等，《太
平御覽》，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〇五，頁一一〇。
- 「王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
盡付之。」（宋）施宿等，《會稽志》，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卷一八，頁二六。
- 此作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書寫於圓筒側理紙上，
並未切割開來，圖片見郝炎峰，〈試論故宮博物院藏
側理紙的年代〉，《文藝生活（藝術中國）》，二〇
一四年第八期，頁一一六。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五，第四十二冊，頁六三八；此文獻轉引
自郝炎峰，〈試論故宮博物院藏側理紙的年代〉，
《文藝生活（藝術中國）》，二〇一四年第八期，頁
一一五。